

## 新潮社在「五四」以前的規章、社員、及社務

本章的重點，意在整理「五四」前新潮社的組織結構，與該社在「五四」以前的活動。筆者認為，在著手研究與社群有關的議題時，若運用如結構主義（Structuralism）的論述模式，藉由成員組成、地緣關係、組織架構這些內容的整理，可從中找出一些蛛絲馬跡，來看該社群結構所表現出的集體意識走向。<sup>01</sup>這也是筆者在這章中欲探討的主題。寄望透過分析

01 例如法國知名人文社會學者，並為結構主義理論的代表人物李維史陀（C. Lévi-Strass, 1908-），他在其探討有關「親緣關係的基本結構」（elementary structure of kinship）的研究專著裡，曾運用分析男性與女性、父親與小孩等族群結構，來解釋二元對立的現象。C. Lévi-Strass, *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*; English trans. (London, 1969). 內容概要並可見彼得·柏克（Peter Burke）的介紹。彼得·柏克（Peter Burke）著，江政寬譯，《歷史學與社會理論》（臺北：麥田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頁221-222。李維史陀他在分析結構上的研究方法，筆者認為，同樣可用來作為社會史研究上的一套方式。

「五四」以前新潮社的社團規範、社員的組成結構，來看出這種社團結構，和該社活動的關聯性。

## 第一節

### 「五四」以前新潮社規章與成員結構分析

#### 一、社團組織與社團規章

關於新潮社的組織、規章和經營方針，是在 1918 年 11 月 19 日第二次社團成立預備會上就拍板定案了。同年 12 月 3 日，更把整個社團組織的詳細內容，公告在《北京大學日刊》上。而「五四」以前，這些規範並未作任何更動。在社團宗旨及經營理念部分，定位為「組成一月刊雜誌，定名曰《新潮》。專以介紹西洋近代思潮，批評中國現代學術上、社會上各議題為職司。不取庸言，不為無主義之文辭」。<sup>02</sup>顯示該社的成立，目的就是為了出版一探討學術與社會議題的雜誌。雜誌發行的銷售目標上，他們期許一年能夠發行十期，且每出五期就設為一卷，並規定該社成員「均為撰述員，擔負雜誌材料供給之責

02 〈新潮社成立啟事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 年 12 月 3 日，第 2 版，【本校佈告】。並載於張允侯等編，《五四時期的社團》（二）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79 年），頁 46。

任」。<sup>03</sup>顯見新潮社是傾全力在促成《新潮》雜誌的發行上。

至於需如何才能加入新潮社？當時已訂出一些社員選取條件，但甄選的標準不嚴苛。如身分為北大學生者，只要投稿三次並經雜誌選用，便可成為該社社員；而非北大人士，除投稿三次經雜誌刊登外，只需要二位以上社員連署推薦，亦可成為當然之社員。<sup>04</sup>

而該社的組織，則分成編輯與幹事兩部。編輯部主管雜誌材料、稿件之審核、取捨及其他編輯相關事務；幹事部負責對外交際、雜誌出版及發行等編輯以外事宜，還請了當時的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，和庶務處主任李辛白（1875-1951）擔任幹事部顧問。<sup>05</sup>

編輯部設主任、編輯、書記三個職務，幹事部亦設主任、幹事、書記三職，兩部主任一職由全體社員選舉產生，於每卷結束時重新改選。至於其他職務之人選，則由主任指派經其他

03 〈新潮社成立啟事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 年 12 月 3 日，第 2 版，【本校佈告】。

04 〈新潮社成立啟事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 年 12 月 3 日，第 2 版，【本校佈告】。

05 在〈新潮社成立啟事〉中，還附有幹事部施行章程，將幹事部所要處理的業務，作細目的說明。幹事部所需執行的業務，包括（一）新潮社集會（二）新潮社社員間的聯絡事項（三）新潮社一切對外接洽事項（四）其餘不屬於編輯部的事項。另外，此部門還須議定雜誌的印刷款式和販售事宜，業務可說是描述非常繁瑣。後來張允侯先生，則將附的部分另外整理出一段資料，使得條文內容變的較易於瞭解。張允侯，〈新潮社組織章程〉，《五四時期的社團》【二】，頁 47-48。

社員同意，與主任分擔連帶責任。<sup>06</sup> 首次職務選舉的結果，傅斯年當選編輯部的主任，幹事部則由徐彥之獲選為主任，筆者並將首屆的所有新潮社幹部名單整理成下表（見表 3-1）。至第二次社團職務改選（1919 年 11 月 19 日）前夕，均由這些幹部主導新潮社雜誌出版及其它社務運作。我們也可將這些成員，視作「五四」前新潮社社務營運上的主要負責者。

表 3-1：第一屆新潮社社團幹部名單（1918 年 11 月 19 日選舉產生）

| 第一屆新潮社職員名單（1918.11.19-1919.11.19） |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|
| 編輯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主任編輯 | 傅斯年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編輯   | 羅家倫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書記   | 楊振聲 |
| 幹事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主任幹事 | 徐彥之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幹事   | 康白情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書記   | 俞平伯 |

資料來源：〈新潮社成立啟事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 年 12 月 3 日，第 2 版，【本校佈告】。張允侯，《五四時期的社團》【二】，頁 51。

## 二、新潮社成員結構

新潮社為一人數不多之小團體。當中的成員，多為當時在學的北大學生。關於這個社團的人員構成，創始社員傅斯年的回憶是這樣的：

06 〈新潮社成立啟事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 年 12 月 3 日，第 2 版，【本校佈告】。

我們是由於覺悟而組合的。……因為彼此生在同一時代，受同樣教育，所以以前的錯誤大致同類，所覺悟的差不多一樣。這可謂知識上的同一趨向。……我以為最純粹、最精密、最能長久的感情，是在知識上建設的感情，比著宗族或戚屬的感情純粹的多。……我們同人結合之先，多沒有什麼交情，若頤剛、子俊合我的關係，原是例外。……雖是我們極好的朋友，而覺悟上有不同時，我們並不為感情而請他。<sup>07</sup>

傅斯年認為，當年加入新潮社的人，幾乎都是因為志趣相投，純粹是因觀念、知識的相互契合，而非好友、親人等人際關係的結合。<sup>08</sup> 若把傅斯年的回憶，拿來與另一新潮社社員張崧年（1893-1986）所言「我最喜歡學術討論……，是的，這便是我為什麼參加新潮社的原因」的回憶比較，<sup>09</sup> 似乎頗能吻合。早期美國學者施奈德（Laurence A. Schneider），將傅斯年對於新潮社人員組成的描述，稱之為「自發性的新潮社共同準則」。<sup>10</sup> 不過，真如傅、張兩人的描述，新潮社社員結構如

07 傅斯年，〈新潮之回顧與前瞻〉，《新潮》2 卷 1 號（臺北：東方文化書局，1972 年，再版景印本），頁 201-202。

08 像大陸學者朱壽桐的看法，更認為新潮社的成立，其志趣相投的主因是起於文藝創作，成員多具備文人素養，使得此社所帶的文學色彩濃厚。朱壽桐，〈新潮社與中國現代文學的雛形〉，《東南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6 卷 4 期，2004 年 7 月，頁 94-96。

09 舒衡哲（Vera Schwarcz）著、李紹明譯，《張申府訪談錄》（北京：北京圖書館，2001 年），頁 53。

10 施奈德（Laurence A. Schneider）著、梅寅生譯，《顧頤剛與中國新史學》

此單純嗎？另一位美國學者舒衡哲（Vera Schwarcz），對於傅斯年等人回憶新潮社的人員組成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。

在舒衡哲的研究中，他指傅斯年回憶新潮社人員組成的說法，為「共同覺醒」的過程。<sup>11</sup>不過，他認為當年傅的回憶，是帶著青年人熱情的情感而流於片面。為此，他針對社員的背景作了分析，結果他發現這個社員結構中，仍具有一定的地域和族群色彩。<sup>12</sup>筆者認為，他在這方面研究上的成果很值得參考，因而循著這種方法，就「五四」前先後入社的新潮社社員作進一步研究（社員名單請見表 3-2），更找出以下兩個有趣的巧合，可從中看出他們能產生「共同覺醒」的真正原因。

表 3-2：「五四」以前新潮社社員一覽

| 第一批入社社員名單（1918 年 12 月 3 日）  |
|---|
| 毛準（子水）、成平（舍我）、汪敬熙（緝齋）、吳康（敬軒）、俞平伯、高元（承元）、徐彥之（子俊）、黃建中（離明）、張崧年（申甫、申府）、陳兆疇（穗庭）、陳嘉謫（杭甫）、康白情（洪章）、傅斯年（孟真）、楊振聲（金甫）、劉敵（名洋）、潘元耿、潘家洵（介泉）、戴嶽（毓峰）、譚鳴謙（誠齋，平山）、羅家倫（志希）、顧頤剛（誠吾） |
| 第二批入社社員名單（1919 年 1 月 1 日）   |
| 陳達材（彥儒）、葉紹鈞（聖陶）、葉塵（石蓀）、劉秉麟（南陔）  |
| 第三批入社社員名單（1919 年 5 月 1 日）   |
| 江紹源、何思源（仙槎）、劉光頤（叔和）   |

資料來源：第一批入社社員名單，參考〈新潮社成立啟事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 年 12 月 3 日；及《新潮》1 卷 1 期，1919 年 1 月 1 日。第二批入社社員名單，見《新潮》1 卷 1 期，1919 年 1 月 1 日。及張允侯，《五四時期的社團》【二】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79 年），頁 46。第三批入社社員名單，見〈社告二〉，《新潮》1 卷 5 期，1919 年 5 月 1 日。

第一，是新潮社的成員，並非急就章的東拼西湊。在找尋「同人者」的過程裡，<sup>13</sup>仍無法避免依靠人類社會中，族群或地域觀念構成的人際網絡。其實，透過人際網絡上的結合，才更易於產生知識、學術及觀念上的「共同覺醒」。意即：社員人際關係上的背景，與引發「共同覺醒」的過程間，有著互為因果的關聯性。而在新潮社社員組成的例子中，族群與地域的人際關係概念，是反映在同鄉和同學的關係上。

（臺北：華世出版社，1984 年），頁 31。此外，像在一創社成員俞平伯的年譜紀錄中，也稱當時新潮社的相關籌備者，都是「在進步教授的思想影響下，集合同好，籌備成立新潮社」。孫玉蓉，〈俞平伯年譜（簡編）〉，載於張國嵐等編，《俞平伯全集》（十）（石家莊：花山文藝出版社，1997 年），頁 434。

11 舒衡哲（Vera Schwarcz）著，劉京建、丘為君譯，《中國啟蒙運動知識份子與五四遺產》（臺北：桂冠，2000 年），頁 67。

12 例如舒衡哲在研究中，發現 6 個幹部裡有 4 個人省籍是山東（實際上應只有傅斯年、楊振聲、徐彥之 3 個），2 個來自浙江（羅家倫、俞平伯），他從此找到了社員在地域背景上的關聯性。見舒衡哲（Vera Schwarcz）著，劉京建、丘為君譯，《中國啟蒙運動——知識份子與五四遺產》，頁 68。

13 筆者在這裡借用了〈新潮發刊旨趣書〉裡對於社員的統稱。傅斯年，〈新潮發刊旨趣書〉，《新潮》1 卷 1 號，1919 年 1 月，頁 1。

在此，筆者整理了「五四」前這三批入社社員的籍貫。發現在可找到的資料裡，這些社員的出生地，集中在廣東（5人）、浙江（4人）、山東（4人）、江蘇（4人）及四川（3人）這五個省份，僅有5名社員籍貫非出自這幾省。<sup>14</sup> 在新潮社成立前，這些人如何得知校內的同鄉，並可聯繫同鄉間的情誼？根據現有的資料來看，筆者認為1917年以後，學生陸續在校內成立的各省同鄉會（如山東同鄉會、四川同鄉會），是最有可能聯絡感情的管道。由於當時校內同鄉會性質的社團，不定期的會舉辦連誼活動。<sup>15</sup> 因此，藉由同鄉會的人際關係管道，可以從中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。除新潮社外，約跟新潮社同時成立的另一北大學生社團國民社，其成員結構也反映了這種屬地主義強的現象。<sup>16</sup> 可見同鄉的關係，是當時社團為找尋

14 在這5位社員中，尚有3位同為兩湖人士（成平、黃建中、劉秉麟）。真正籍貫不屬於這些地區的社員，僅有張崧年（直隸獻縣）與江紹原（安徽陞德）這兩人。而關於新潮社諸社員的出生背景，見吳相湘主編，《民國史料叢刊5·國立北京大學紀念刊》（二）（臺北：傳記文學，1971年重印），【在校同學錄】。

15 關於各同鄉會的活動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中都會有記載，可參考這方面的紀錄。

16 以現有資料來看，國民社在「五四」前，社員約有185人，是一人數眾多的大型社團。筆者進一步將社員中為北大學生者，其籍貫作個整理，發現兩湖人士佔了近當中的一半（湖南50人、湖北21人）。此外，出生於南方籍貫的學生總人數更遠超過北方籍貫者，顯示出這個社團的社員結構，屬地主義較新潮社更為濃烈。可見透過同鄉的關係尋找社員，並不是僅有新潮社這個社團，而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常態，這可能才符合了新潮社原本在找尋社員上的定位。有關國民社社員的籍貫，見吳相湘主編，《民國史料叢刊5·國立北京大學紀念刊》（二），【在校同學錄】。

成員時必須借用的一種人際網路，新潮社也無法避免，而這也是促成「共同覺醒」的一大主因。

此外，淵源頗深的同學關係，亦為誘發「共同覺醒」的另一主因。如前所提，社員多為北大學生，且多為同系前後期同學。<sup>17</sup> 而他們同窗的時間，甚至可以追溯到其就讀大學本科之前。也就是說，這些北大學生，彼此間的交情已非一兩天的點頭之交，甚至本來就是推心置腹的好朋友。這裡，筆者要以傅斯年的求學背景為主軸，來看幾位核心成員早在新潮社成立前的同學情誼。

傅斯年是在1913年，從天津的府立中學堂畢業，一畢業後就順利的於同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就讀。<sup>18</sup> 以此推算，到1918年底新潮社成立時，傅斯年在北京大學已待了5年多的時間。在這段不短的北大求學過程中，傅斯年自然能透過同學關係，結識了日後為社員的北大同窗，例如顧頡剛與毛子水。

17 當時有關新潮社社員為北大同科學生間的交誼狀況，可參見歐陽哲生的介紹。歐陽哲生，〈傅斯年與北京大學〉，《傳記文學》69卷2期，1996年8月，頁16-18。

18 關於傅斯年求學時代的整理與介紹，早年已有不少人士撰寫過，像吳相湘主編有關民國人物的傳記裡的內容，就算是一目了然的將傅求學歷程，有條理的作了簡介。〈傅斯年舉行並茂〉，載於吳相湘主編，《民國百人傳》（一）（臺北：傳記文學出版社，1971年），頁215-217。而近期王汎森先生所寫的傅斯年傳記中，更詳細的介紹了傅斯年從中學、進入預科、至大學時代的詳細經歷。Fan-Sen Wang (王汎森), *Fu Ssu-nien: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* (New York: Cambridge Press, 2000), pp18-33.

當年的顧頡剛，同樣於 1913 年進入北大預科就讀，並且在預科時代，傅斯年跟顧頡剛都曾在章太炎（1869-1936）的門下，所以有了交集。<sup>19</sup> 從預科升為本科生之後，傅、顧兩人的交情更為密切，在 1917 年還成為了同寢室的室友。<sup>20</sup> 而毛子水亦是出身於北大的預科體系，在預科就讀的時候，就因在校內譯學館上課的緣故，認識了同棟的傅斯年，並變成關係密切的好友。<sup>21</sup>

即便是社員中的非北大人士，他們早年的求學經歷仍與這批學生有過同學之情。如顧頡剛所引薦的葉聖陶，即為顧在蘇州就讀中學時的同窗。<sup>22</sup> 由此可知，他們的「共同覺醒」並非是偶發的，主要仍循著同學或是同鄉這類傳統的人際網絡所產生。

19 顧頡剛是在剛進北大預科就讀的 1913 年冬天，參加了章太炎所辦的國學會。在國學會解散後，1914 年秋天又在北大預科上章太炎弟子馬裕藻（1878-1945）和沈兼士（1887-1947）所開的課程。顧頡剛，〈自序〉，《古史辨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92 年），頁 23-29。而傅斯年最早也是崇信章太炎學說的學生，他在預科畢業後選擇考北大文學門，也是受到章太炎觀念的啟發，可參見毛子水的描述，和王汎森先生的研究。毛子水，〈傅孟真先生傳略〉，《師友記》（臺北：傳記文學出版社，1967 年），頁 90。Fan-Sen Wang, *Fu Ssu-nien: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*, pp.18-24.

20 顧頡剛，〈自序〉，《古史辨》，頁 36。

21 毛子水，〈我與孟真的交往〉，載於《毛子水全集》（五）（臺北：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，1992 年），頁 49。

22 葉聖陶是顧頡剛中學時代的同學。「五四」以後，顧頡剛又先後介紹另外兩個他中學時代的朋友王鍾麒和郭紹虞入社。見顧頡剛，〈回憶新潮社〉，載於張允侯，《五四時期的社團》（二），頁 124。

第二，新潮社之學生社員有一共同特質：即未入社團前在校內已小有名氣，算是校園內風雲人物。這些學生與多數中國傳統學生不同，他們無怯於公開場合展現自我，善把握機會以嶄露頭角，熱心校內公共事務及課外活動。易言之，他們在當時算是北大學生中的代表人物。正因如此，他們的言論有一定的公信力，此有助於新潮社成立後理念的傳播。何以證明這些學生在新潮社成之前已是北大風雲人物？這從二點可以看出。一、他們加入新潮社前，就已經是其他社團的成員或幹部，可見他們相當活躍於校內。二、對於班上或校內各項活動（如捐款、演講等），他們都積極參與，甚至身兼班上的幹部或校方所辦活動的主事者。今將「五四」以前的學生社員，在入社前的北大校園經歷以圖表方式簡述（見表 3-3、3-4），以便瞭解他們那時校園裡名氣之所歸。

表 3-3：新潮社中北大學學生入社前的校園資歷（1）

| 第一批入社成員的校園經歷（1918 年 12 月 3 日入社者） |     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|
| 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入社時學級         | 入社前的校園重大資歷  |
| 毛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本科數學門 2 年級生   | 數理學會社員兼發起人，並曾擔任雄辯會改組前的社團幹部。同時，他也是當時理本科數學門的班長，及《理科大學月刊》編輯。 |
| 成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文本科國文門 1 年級生。 | 無紀錄。  |
| 汪敬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法本科經濟門 4 年級生  | 擔任過北大學生儲蓄銀行籌備委員會委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吳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文本科哲學門 2 年級生  | 進德會社員、並志願擔任校役夜班中的算學、世界語、英文門教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| 第一批入社成員的校園經歷（1918年12月3日入社者）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|
| 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入社時學級              | 入社前的校園重大資歷  |
| 俞平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文科國文門3年級生          | 國文研究所社員。  |
| 徐彥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文本科哲學門3年級生         | 曾擔任樂理研究會的籌組負責人，同時，他並為文本科哲學門的班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陳兆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文本科英文門2年級生         | 雄辯會社員。  |
| 陳嘉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文本科哲學門3年級生         | 曾獲文本科哲學門的優待生資格。   |
| 康白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文本科哲學門2年級生         | 進德會、哲學會社員，且擔任過校役夜班國文門教員、北大國史編纂處召集人，和進德會糾察員之職。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傅斯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文本科國文門3年級生         | 國文研究所、進德會社員，並且是北京大學消費公社發起人、校役夜班修身門教員，以及擔任進德會評議幹部。                 |
| 楊振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文本科國文門3年級生         | 無紀錄。  |
| 劉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文本科史學門2年級生         | 無紀錄。  |
| 潘元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理本科化學門3年級生         | 雄辯會、進德會、體育會、理科化學演講會、畫法研究會社員，並是理科化學演講會發起人、消費公社股東。                  |
| 潘家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文科英文門3年級生。         | 進德會社員，並且參與校方發起的幫助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復建捐款活動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譚鳴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文本科哲學門3年級生         | 哲學會、靜坐會、新聞研究會社員，並是新聞研究會發起人和哲學會評議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羅家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文本科英文門2年級生         | 進德會社員，擔任過校役夜班理科、修身門教員、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編輯部特約西山旅行通信員。同時並是文本科英文門的班長、進德會評議員。 |
| 顧頡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休學中（休學前為北大哲學門3年級生） | 畫法研究會社員，並參與過校方發起的幫助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復建捐款活動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資料來源：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7年11月16日－1918年12月24日。李惠惠，《新潮雜誌與新文化運動》（臺北：國立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

文，1985年），頁312。吳相湘主編，《民國史料叢刊5·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》（臺北：傳記文學，1971年景印本）（二）。

表3-4：新潮社中北大學生者入社前的校園資歷（2）

| 第二批入社成員的校園經歷（1919年1月1日入社者） 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入社前學級       | 入社前的校園重大資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陳達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法本科政治學門4年級生 | 進德會社員，曾獲得法本科政治門優待生資格，且為法本科政治學門的班長。    |
| 葉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文本科哲學門1年級生  | 哲學研究會的發起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第三批入社成員的校園經歷（1919年5月1日入社者） 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入社前學級       | 入社前的校園重大資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江紹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文本科哲學門2年級生  | 進德會社員，曾於中央公園公開發表〈協約國之勝利為中國文化之勝利〉專題演講。 |
| 何思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文本科哲學門1年級生  | 於北大預科就學時，曾為該英文班的班長                    |

資料來源：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7年11月16日－1919年4月30日。吳相湘主編，《民國史料叢刊5·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》（二）

從以上的整理中，可看到當時新潮社的學生成員，除成平、楊振聲、劉敵三人外，其餘社員在加入該社前，都已在校內小有名氣。當中有學業優異獲優待生資格者（陳嘉謫、陳達材），有班級幹部乃至領袖者（毛準、徐彥之、陳達材、何思源），有社團活躍人物者（像傅斯年、康白情、潘元耿、譚鳴謙等人，更參加好幾個社團，或者是社團發起人），甚至有校方主辦活動之籌劃者或積極參與者（汪敬熙、康白情、傅斯年、

羅家倫、潘家洵、顧頡剛)。由於先前種種付出中所累積起名聲，相對使他們能成為校內學生圈中的知名人物。且讓新潮社成立後，很快便能在校園中發揮出號召力。

## 第二節 新潮社在「五四」前的活動

### 一、出版及發行《新潮》雜誌

新潮社的成立目的，就是為了發行《新潮》雜誌。而在1918年12月3日《北京大學日刊》的社團成立公告上，該社將創刊號的出版時間，預定在1919年的1月1日。<sup>23</sup>然而，因託印單位的耽誤，導致創刊號延宕到1月12日才正式推出。<sup>24</sup>只是，除這段小插曲外，「五四」前的《新潮》雜誌，後來仍陸續在印刷和發行的過程上面臨難關。

如最初新潮社成立預備會期間，師長輩的蔡元培、李大釗、陳獨秀曾允諾給於新潮社實質上的幫助，且為了讓雜誌可以順利發行，更擬定日後雜誌的出版管道和經費，可直接用北京大學校內出版部的名義辦理。然此一約定，在《新潮》

23 〈新潮社成立啟事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年12月3日，第2版，【本校佈告】。

24 傅斯年，〈新潮之回顧與前瞻〉，《新潮》2卷1號，頁200。

首期出版不久就面臨失效的窘境。據傅斯年回憶，可能是不滿《新潮》言論的人士「常以學校補助《新潮》為題目，責備校長」，加以北大當時除新潮社外，還有其他以出版刊物為主的社團，以及新出版社團的醞釀及陸續成立，使得「學校方面既沒有——補助的力量，又不能有重有輕」。<sup>25</sup>這並迫使北大校方評議會通過一項議案：即對於校內各社團的出版刊物，校方的補助改為一律代墊款前三期，<sup>26</sup>這也造成新潮社面臨要被迫停刊的危機。因此，新潮社全體社員當時寄了陳情信給學校評議會。學校評議會在瞭解新潮社當時處境後，就答應他們對新潮社的資助仍照原案，雜誌才得以續行。幸虧《新潮》創刊後的銷售成績很亮眼，才讓後來傅斯年會笑稱當年的陳情是「過慮」了。<sup>27</sup>然而，從這個發行過程裡，我們可看到「五四」前的新潮社，發行雜誌時並非都獲校方的支援，期間也曾面臨斷炊的問題。<sup>28</sup>

在《新潮》雜誌的銷售系統上，販售通路有北大校內和校外之分。校內部分，因有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及庶務處主任

25 傅斯年，〈新潮之回顧與前瞻〉，《新潮》2卷1號，頁200。

26 傅斯年，〈新潮之回顧與前瞻〉，《新潮》2卷1號，頁200。

27 傅斯年，〈新潮之回顧與前瞻〉，《新潮》2卷1號，頁200。

28 像《國民》雜誌發行人之一的許德珩，似乎就頗吃味當時《新潮》雜誌的發行情況，和新潮社得到師長支援的過程。許德珩，〈回憶國民雜誌社〉，載於張允侯編，《五四時期的社團》【二】，頁38-39。

李辛白擔任新潮社顧問，<sup>29</sup> 在這兩位主任居中幫忙下，新潮社順利的在北大校內的文科、理科、法科三科出版部，建立起銷售據點。

<sup>30</sup> 另外，《新潮》也用贈送方式來增加閱讀率和能見度。但贈送對象不針對個人。<sup>31</sup> 以當時新潮社在校內贈送雜誌的對象為例，贈送名單除校長、圖書主任跟庶務主任外，贈送書的對象為圖書館閱覽室、日刊的編譯會書庫、各學科的教授會及閱覽室、國史編纂處及社團「閱書報社」這類的公共場合，<sup>32</sup> 雖全校師生都可以不花分文，在這些校內的公共空間閱讀到《新潮》，但若想要真正擁有一本，還是得自費購買。而新潮社採取的這種雜誌推行方式，一方面是普及化的讓新潮社的言論能在校內快速傳播開來，迅速提升新潮社在校園中的影響力。同時，也可穩定《新潮》雜誌在校內的銷售額。

校外銷售據點部分，校方能幫的忙有限，所以新潮社需自

29 〈新潮社成立啟事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年12月3日，第2版，【本校佈告】。且在該啟事中所附的幹事部施行章程裡，還有條文明定「本部敦請圖書館主任、庶務部主任為顧問，所有本誌印刷、登廣告、發行及其他銀錢出入事項，即由兩主任分派出版部、雜務課、會計課事務員執行之。」

30 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9年1月13日，第3版。

31 不贈送雜誌給單一個人，是因出版事項不是完全由新潮社自己負責，所以社員每人平均也僅分得一兩份雜誌，根本不敷分送友人之用。〈新潮雜誌社啟事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9年1月13日，第三版。

32 〈新潮雜誌社啟事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9年1月24日，第2版。

行設法。若據1919年10月出的《新潮》來看，可知《新潮》在一些大城市，甚至海外都有銷售據點（見表3-5）。但這是「五四」運動後半年以後的事，此時《新潮》因五四的推波助瀾而享盛名，故銷售據點多不足為怪。在「五四」前，《新潮》校外銷售據點之多寡，則限於現有資料不足，無法得到詳細的數據。僅知那時為打開雜誌在校外知名度與銷路，他們所作過的努力。例如他們會在報紙與刊物上刊登廣告，希望藉此引起一般閱讀者的注意。及與一些色彩相似的友刊結盟，以收紅花綠葉之效。<sup>33</sup> 總之，為開拓《新潮》在校外之銷量，新潮社確實也煞費苦心。

表 3-5：1919 年《新潮》雜誌銷售據點一覽

| 城市   | 販賣處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北京   | 中華書局、東安市場、賓宴華樓、青雲閣各書莊  |
| 上海   | 群益書社、亞東圖書館             |
| 日本東京 | 牛込區鶴卷町新中學舍、童啟顏先生       |
| 天津   | 中華書局、新華書局              |
| 蘇州   | 振新書社、國民圖書館、文怡書局、角直鎮教育會 |
| 南京   | 高等師範日刊處                |
| 武昌   | 中華大學、惲代英先生             |

33 像這時期《新潮》雜誌中，曾有【書報介紹】這類的專欄，專門介紹與自己立場相近的報刊。透過這類的介紹，達到結盟的效果。另外在《新潮》裡選擇刊登的廣告上，也多接受支持自己立場的團體其所要委託的廣告（如《新青年》、北京大學出版部之類），透過這種方式來建立起較多的銷售網，以至於打開銷售通路和知名度。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長沙 | 儲英源體育週報社、朝宗衍湘雅醫學校、群益圖書社、保節堂街、胡博蘇先生 |
| 廣州 | 高等師範學生貿易部、雙門底上街共和編譯分局              |
| 紹興 | 墨潤堂書莊、大路教育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杭州 | 聯橋袁震和綢莊、第一師範學校書報販賣部、浙江省教育會         |
| 梧州 | 大南門通學書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濟南 | 院前十一號齊魯通訊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開封 | 青雲堂心聲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參考資料：《新潮》2卷1號，1919年10月30日

此外，在最新整理出的《顧頡剛日記》中，因顧於1919年1月14日的日記裡，有轉錄另一社員徐彥之的的販售規劃，從中更看到新潮社的核心成員，在事先就作出相當完整的安排。他們對於如何打開雜誌知名度、價錢定位、販賣數量、管道的安排等和銷售有關的事宜都有規劃，摘錄如下：

子俊（按：徐彥之）來信，告《新潮》雜誌發行情形，可現出出版界情形。……每期印一千份，每一中國頁，即西式兩頁，大洋一元五毛八分。每期頁數約在百五六十頁（比《新青年》厚，與《太平洋》相等）如此情形每期印費約在百四十元上下。其外尚有廣告費及其他零用，亦需三四十元。<sup>34</sup>

34 顧頡剛著、方清河、簡美玉主編，《顧頡剛日記》（一）（臺北：聯經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1919年1月14日條，頁66-67。

以上所談是關於行銷策略，如印刷、廣告等支出的規劃。另外，該天日記中還談到販售的方法，提到用經銷商訂大量雜誌庫存來代售的方式，但經銷商倘若「買了去，無論賣出不賣出，一概不退，照五折收價」，而每販售一本，新潮社就可抽成一毛五分或是一毛八分（代售處部分的規範）。<sup>35</sup>若有校外大型書店想代販，新潮社一樣會用五折價賣給他們，並強調「我們對於書店，給他們有賺錢的地步」，希望透過這種善意的態度，找到固定的校外販售管道。<sup>36</sup>我們從這份剛公開的資料中，可看到新潮社社員他們在事前所作的周詳安排。

而雜誌的訴求對象上，是以中學體系的學生為主。<sup>37</sup>而整個雜誌的內容風格設計，由〈新潮發刊旨趣書〉來看，該雜誌的內容走向是定位在「喚起國人對於本國學術之自覺心」、「為不平之鳴，兼談所以因革之方」、「鼓動學術上之興趣」、「協助中等學校之同學……於修學立身之方法與途徑，盡力研求，喻之於眾」這四項。<sup>38</sup>可知創刊之初的《新潮》雜誌風格，是定位為一份文化評論及學術討論性質的刊物。

35 顧頡剛著、方清河、簡美玉主編，《顧頡剛日記》（一），頁67。

36 顧頡剛著、方清河、簡美玉主編，《顧頡剛日記》（一），頁67。

37 從〈新潮發刊旨趣書〉中的「本誌發願協助中等學校之同學，力求精神上脫離此類感化」這段話裡，可看出這份雜誌是希望在中學生界中產生作用。甚至可言，他們希望獲得中學生為主的閱讀市場。傅斯年，〈新潮發刊旨趣書〉，《新潮》1卷1號，1919年1月，頁3。

38 傅斯年，〈新潮發刊旨趣書〉，《新潮》1卷1號，1919年1月，頁1-3。

同時，〈新潮發刊旨趣書〉也指出，北大校風革新以後，便跳出了當時中國社會風氣的窠臼，接軌於世界真正的主流。所以，這批以北大學生為主的新潮社成員，希望憑一己之力「勉為一二分之贊助：一則以吾校之真精神喻於國人，二則為將來之真學者鼓動興趣」，<sup>39</sup> 作為國內風氣轉變的先導。加以受陳獨秀、胡適所提倡文學革命、白話文學的影響，《新潮》雜誌以白話文為主。不僅編輯群為文如此，讀者來稿亦需為白話文，否則不予刊出。<sup>40</sup> 支持文學革命的立場鮮明，而內容、編排和文章格式又有自己的風格，讓該雜誌在當時的眾多報刊中，塑造出與眾不同的特色。

## 二、出版《新潮》以外的社務

誠然，《新潮》雜誌的出刊及營運，是新潮社的活動主軸。但在此之外，新潮社還有別的社務在進行，以加速其理念之推廣。這些活動，分為整體與個人兩部分。

### （一）整體活動

整體活動，係指社團成員共同參加某種特定之活動。在這部分上，1919年2月2、3日的北大學生游藝大會（類似現今的大專院校社團成果展或社團聯合大會），是新潮社在「五四」

前所參與過的重要校內活動。

這個活動，是北大畫法研究會所發起，於1919年1月11日召開籌備會，會中擬定該次大會要對外開放。<sup>41</sup> 當時，新潮社受邀參加這個活動，而社員中的傅斯年、羅家倫、徐彥之、康白情、譚鳴謙（1886-1956）及潘元耿，還分別兼任了這次大會的籌辦工作。<sup>42</sup> 在大會的活動安排上，則大多讓這些社團共同籌劃。最後決定當天的游藝大會，將有名畫與字帖展覽（畫法研究會及書法研究會時練習成果，及向各方收藏家邀集收藏品而來）、中西樂曲表演、新科技製品展覽、幻術表演和道具展覽、歐洲戲劇及自創新戲劇表演、辯論比賽表演、技擊表演、新式燈謎（籌備會中的文虎部負責）、軍樂表演和抽獎活動。<sup>43</sup>

學生游藝大會的內容，多反映了各社團的平日活動，可視

41 〈學生遊藝大會籌備紀事（第一）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9年1月17日，第4版，【本校紀事】。

42 當時的籌備工作，共分成總務部、門券部、招待部、出售食品部、出售字畫部、經理彩品部、保管字畫部、保管畫會成績部、軍樂部、音樂部、文虎部（新式燈謎）、捧術部、辯論演說部、科學遊藝部、書畫部、幻術部、新劇部與舞蹈部共十八個單位。傅斯年、羅家倫、許彥之康白情是總務部文書科協辦人員，譚鳴謙是招待部人員，潘元耿是保管畫會成績部人員，他們分別隸屬各部從事籌辦學生遊藝大會事宜。見〈學生遊藝大會籌備會通告（第二號）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9年1月17日，第2版—第3版，【本校佈告】。

43 〈北京大學之學生遊藝大會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9年1月31日，第1版。

39 傅斯年，〈新潮發刊旨趣書〉，《新潮》1卷1號，頁1。

40 〈社告一〉，《新潮》1卷1號，1919年1月。

為各社團的成果展。某些內容還體現新文化運動的議題，與新潮社在雜誌上所倡導的理念相通。像這次大會上表演的自製中國新劇，便是在戲劇改革上的一個嘗試。而戲劇改革，又是從新文化運動衍生出的一大議題，支持及反對雙方，都在這個議題上有過激辯。<sup>44</sup> 故在這次學生遊藝大會中，表演的兩齣新戲〈不如歸〉和〈新村正〉，可視為響應戲劇改革的實際行動。〈不如歸〉為北大學員創作；而〈新村正〉則是南開中學剛在該校創作並演出不久，就被北大學生拿來在這次學生游藝大會中公演的新戲。<sup>45</sup> 而當時支持戲劇改革的宋春舫（中國近現代劇作家，1892-1990），在真正看過該新式劇後，更在《新潮》雜誌中著文給予好評。<sup>46</sup>

又這次大會中的其他活動，如科學展覽、西洋樂曲演奏、辯論演說、乃至新式燈謎活動，有許多是強調用「新」的表達

44 舉例來說，傅斯年就曾於《新青年》上發表〈戲劇改良面面觀〉及〈再論戲劇改良〉兩文，跟同為北大學生，但為舊戲辯護的張厚載有過論戰。傅斯年，〈戲劇改良面面觀〉，《新青年》5卷4號，1918年10月15日。及傅斯年，〈再論戲劇改良〉，《新青年》5卷4號，1918年10月15日。載於歐陽哲生編，《傅斯年全集》（一），（長沙：湖南教育出版社，2003年），頁41-75。而李孝悌先生，也曾針對民初以來戲劇改革的研究做了詳細的整理。李孝悌，〈中國近代大眾文化中的娛樂與啟蒙：以改良戲曲為例〉，載於張啟雄主編，《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00），頁967-994。

45 〈學生遊藝大會籌備會紀事（第二）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9年1月25日，第4版，【學生紀事】。

46 宋春舫，〈評新劇本新村正〉，《新潮》1卷2號，1919年2月，頁341。

或詮釋型態。其能否被接受，根據大會的紀錄來看，是正面的，像新劇、新式燈謎、幻術、音樂等，參觀者都給予很高的評價。<sup>47</sup> 也就是說，新潮社以及其他社團，在該次大會中所推廣的新式文化或科技，不論校園內外都能廣獲認同。這反映出此時因學生和其他相關人士的努力，使新文化運動訴求的被接受度已大為提升。

## （二）社員個人活動

社員在新潮社社務外的個人活動，因有不少是和他們在《新潮》雜誌上所談的內容有關，故雖名為社員個人活動，仍須視為新潮社理念傳播的延伸。加以《新潮》雜誌中所談論的內容，其引發的迴響不一定出現在《新潮》雜誌上。例如，《新潮》創刊號出版後，傅斯年在創刊號中，發表了一篇評當時北大教授馬敘倫（1882-1970）所寫的《莊子筭記》之書評。<sup>48</sup> 馬敘倫在看過《新潮》後，也隨即發表了文章回應傅的看法並提出自己的意見。然而，馬並不是在次期的《新潮》中回文，而是在《北京大學日刊》上發表回應。<sup>49</sup>

47 總計兩天的學生遊藝大會，每天都有一千多人到場參觀，其中一些與「新」有關的活動如音樂、舞蹈、幻術、文虎（新式燈謎）、新劇這些活動更是特別受歡迎。見〈學生遊藝大會開會誌略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9年2月6日，第3版，【本校紀事】。

48 傅斯年，〈馬敘倫之莊子筭記〉，《新潮》1卷1號，1919年1月，頁133-136。

49 馬敘倫，〈釋《新潮》中評莊子筭記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9年1

此外，站在社員的立場而言，每一社員在新潮社外所談的議題，有些延續了新潮社的議題精神，有些則奠定了他們在《新潮》雜誌中發表的文章內容基礎。如1918年4月，傅斯年在《新青年》中發表的〈中國學術界思想界之基本謬誤〉一文，到了《新潮》創刊後，傅所寫的一些文章的精神還延續了〈中國學術界思想界之基本謬誤〉中的內容及精神。<sup>50</sup>故新潮社員個人在外的活動，也無法跟新潮社完全切割。

而新潮社員在外的個人活動，則以發表文章於其他刊物為主。這又分為校內與校外兩部分。

校內部分，以《北京大學日刊》為主要發表處。延續第二章的內容，可知新潮社成立後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仍是北大師生發表言論的一個重要空間。因此，新潮社的社員，也利用過《北京大學日刊》發表文章。不過，這時新潮社社員在《北京大學日刊》中發表的文章數量，已遠少於1918年時期。主因是這時新潮社社員的發文重心，經轉到自己的刊物《新潮》了。

「五四」以前，新潮社員只在《北京大學日刊》上發表過兩篇文章，分別為陳家謫及陳達材（1890-?）所發表。

月18日—1月21日。

50 如傅斯年在《新潮》雜誌創刊號中所發表的〈人生問題發端〉和〈萬惡之原〉，有些部分還可以看到與〈中國學術界思想界之基本謬誤〉的訴求相近之處。傅斯年〈人生問題發端〉，《新潮》1卷1號，1919年1月1日，頁5-17。傅斯年，〈萬惡之原〉，《新潮》1卷1號，1919年1月1日，頁124-128。

陳家謫從1919年1月8日，連續4天發表了〈箴學（文理合科意見書）〉一文，<sup>51</sup>談中西哲學跟科學間的關聯，此屬陳個人學術見解。陳在文中形容哲學與科學的關係，就像是樹幹跟樹枝，從樹幹長出樹枝，而樹枝又會利用光合作用合成養分來培育樹幹，樹幹在吸收到這些養分後才會讓樹枝掌出花朵來（陳以花朵喻為文學、美術）。<sup>52</sup>另外，他還引中外哲學家們的言行及思想，與西方科學家們的實驗與理論相互對照，證明科學與哲學關係密切。<sup>53</sup>此文雖與其在《新潮》發表之文章關聯不大，但重點在於此文是他的個人學術見解，而學術討論又是《新潮》雜誌的主軸，故此文實為《新潮》在議題倡導中的一個延伸。

至於陳達材，則是在1919年3月間，於日刊上翻譯了當時西人韋羅貝的演講，作成〈協約國與普魯士政治理想之對

51 陳家謫，〈箴學（文理合科意見書）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9年1月8日—1月11日，第四版，【文藝】。

52 陳家謫，〈箴學（文理合科意見書）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9年1月8日，第四版，【文藝】。

53 文章中舉了中國歷代思想家如莊周、孔子、墨子、子貢；西方思想家如盧梭（J. Rousseau, 1712-1788）、邊沁（J. Bentham, 1748-1832）、尼采（F. W. Nietzsche, 1844-1900）、達爾文（C. R. Darwin, 1809-1882）、克魯泡特金（P. Kropotkin, 1842-1921）等人的言論。與西方在數學及科學界上的重要人物如畢達哥拉斯（Pythagoras, 約580-500 B.C.）、歐幾裏德（Euclid, 約330-275 B.C.）、牛頓（I. Newton, 1643-1727）、富蘭克林（B. Franklin, 1709-1790）等人的理論相對照，藉此找出科學與哲學間確有共通點。見陳家謫，〈箴學（文理合科意見書）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9年1月9日—1月10日，第四版，【文藝】。

抗〉一文。<sup>54</sup>該演說內容，是談當時剛結束不久的一次世界大戰過程。提到協約國和與德意志帝國之間，因政治理念的不同導致互相對立甚至引發一次大戰。藉由陳達材的翻譯，有助於當時民眾瞭解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潛因，並瞭解戰前的國際局勢。

校外部份，進入1919年後，新潮社社員鮮少在《新青年》上發表過個人意見了。筆者推測，可能因不希望被外界認為《新潮》是《新青年》的附庸，因此這段時期新潮社社員在外面發表文章時，可能會刻意跟《新青年》做個區隔。新潮社社員在「五四」爆發前這段期間，則多利用當時能包容甚至同樣支持新思潮的大型報紙，作為發表意見的公開管道。其中，以《晨報》為主要發言場所。

《晨報》原名《晨鐘報》，原是梁啟超（1873-1929）、湯化龍（1874-1918）等研究系人物所辦的報紙。<sup>55</sup>該報由於在1918年期間，發表了一些抨擊北洋政府政治局勢的文章而遭禁，後才於1919年1月改組為《晨報》。<sup>56</sup>而該報當時立場，

54 陳達材，〈協約國與普魯士政治理想之對抗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9年3月1日－3月5日。

55 中共中央馬克思·恩格斯·列寧·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，《五四時期期刊介紹》（二）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79年），頁98。

56 有關這時期北洋政府查禁各大報的原委，可參見當時報界名人戈公振（1890-1935）日後的敘述。戈公振，《中國報學史》（臺北：學生書局，1964年），頁185-187。

對新文化運動是採支持的態度，所以《新潮》雜誌甚至在1卷3號中，特別向讀者推薦《晨報》，並視該報言論跟新潮社一樣同屬新派陣營，足見《晨報》在新文化運動中的立場上與新潮社接近。<sup>57</sup>因此，新潮社社員較喜愛在《晨報》上發表文章。「五四」以前，就有羅家倫、徐彥之、傅斯年、成平（即成舍我，1898-1991）等人，先後在《晨報》中發表文章。

羅家倫在《晨報》上的文章連載時間很長，從1919年2月一直持續到「五四」前後，幾乎天天在報紙上都可見到他的文章，而羅投在《晨報》的文章都是翻譯作品居多。這些翻譯內容有的跟西方新思想有關、有的則是時最新的國際政治局勢，且羅家倫在翻譯的過程中，有時還會在文章的末節加入一些自己的意見。所以，他在這段期間的翻譯文章，也間接反映了他《新潮》雜誌中未提到的個人意見。<sup>58</sup>透過他的翻譯，也讓《晨報》的讀者群，對於當時國際上各項新資訊有所瞭解。此外，他寫的小說〈是愛情還是苦痛？〉，在《晨報》上也曾

57 記者，〈書報介紹——《晨報》〉，《新潮》1卷3號，1919年3月1日，頁541。

58 總計1919年2月至5月間，羅家倫共在《晨報》的【自由論壇】欄中，翻譯了〈實際主義〉（1919年2月7日－2月9日）、〈對於萬國和平會的警告〉（1919年2月10日－2月12日）、〈協約國之危機〉（1919年2月14日－2月21日）、〈美洲新論〉（1919年2月22日）、〈威爾遜總統之單獨手腕〉（1919年2月23日－2月24日）、〈大戰後之民生主義〉（1919年2月27日－4月17日）、〈俄國革命史〉（1919年4月19日－5月5日）7篇文章。

被轉載。<sup>59</sup>

徐彥之則在《晨報》上發表過數篇批評當時中國社會風氣，與提出建言的文章。首先是3月17日至19日，《晨報》刊登了徐彥之投稿的〈說思想〉。此文是徐彥之節錄他自己在《新潮》1卷2號中所寫的〈邏輯漫談（譯 Jerusalem《哲學概論》之一章）〉的部分理論，把這些理論再加以擴充。<sup>60</sup>他更認為透過創造新思想，可以創造出符合當的新事實，強調人不能一味守舊。<sup>61</sup>此文談的層面雖較抽象，但批判中國當時風氣的味道卻很濃，很符合《新潮》雜誌的特色。

隨後，在1919年3月22日至25日，徐又發表〈實驗主義的方法論〉一文，針對胡適引進的實驗主義，提出自己的看法，並將實驗主義分成「狹義的」跟「廣義的」兩種，徐同時也批判狹義的實驗主義，並提出落實廣義的實驗主義的可能性。<sup>62</sup>

在此之後，至「五四」爆發產生的迴響前，徐又先後發表〈青年學生的危機〉與〈男女交際問題雜感〉兩文。〈青年學

生的危機〉的主旨，與1918年1月羅家倫在《新青年》中所發表的〈青年學生〉一文一樣，都希望當時學生能跟上時代潮流，不要再被一些迂腐的舊思想綁住。但兩人文章的切入角度有所出入。徐認為每個學生的人格本是純潔的，但在學習過程中小心不要被守舊、骯髒的政客及軍閥污染，<sup>63</sup>這與羅在1918年初所寫的〈青年學生〉中對學生當時的品格觀察有些不同。<sup>64</sup>而〈男女交際問題雜感〉的內容，則是響應男女平權的風潮，並且重申在《新潮》雜誌裡，許多社員所倡導的婚姻自由及自由戀愛觀。<sup>65</sup>而這幾篇徐在《晨報》上的投稿內容，更緊扣著新潮社想推動的理念和訴求。

傅斯年的投稿，則有關於國際事件的評論文章。1919年3月1日，韓國爆發了抵抗日本的獨立運動，傅斯年注意到這個國際要聞後，立刻在《晨報》上寫了〈朝鮮獨立運動之新教訓〉一文，希望藉朝鮮的獨立運動，喚起當時國內人民的對於救國的強烈使命感。<sup>66</sup>傅並把這個連載文章，轉收入自《新潮》雜

59 羅家倫，〈是愛情還是苦痛？〉，《晨報》，1919年4月12日—4月16日，第七版，【小說】。

60 徐彥之，〈說思想〉，《晨報》，1919年3月17日，第七版，【自由論壇】。

61 徐彥之，〈說思想〉，《晨報》，1919年3月18日—3月19日，第七版，【自由論壇】。

62 徐彥之，〈實驗主義的方法論〉，《晨報》，1919年3月22日—3月25日，第七版，【自由論壇】。

63 徐彥之，〈青年學生的危機〉，《晨報》，1919年4月12日—4月15日，第七版，【自由論壇】。

64 羅家倫在1918年時的說法，是認為當時守舊之學生源於自甘墮落，才會跟著傳統的思維走。見羅家倫，〈青年學生〉，《新青年》4卷1號，1918年1月15日，頁70-74。並載於羅家倫先生文存編輯委員會編，《羅家倫先生文存》（一）（臺北：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，1976年），頁383-389。

65 徐彥之，〈男女交際問題雜感〉，《晨報》，1919年5月4日—5月5日，第七版，【自由論壇】。

66 傅斯年，〈朝鮮獨立運動之新教訓〉，《晨報》，1919年3月20日，

誌的1卷4號上。<sup>67</sup>

至於在《新潮》雜誌中從未發表過文章的成平（因此之故，於1919年12月被取消社籍），<sup>68</sup>也在1919年4月4日《晨報》上用「舍我」筆名投稿小說〈吾友〉。這篇小說談一位他的朋友，雖天生聰敏又有抱負，但被傳統家庭教育及迂腐思想所累，抑鬱而終的故事。<sup>69</sup>這個小說的主旨，與當時《新潮》雜誌所刊小說風格類似，<sup>70</sup>即透過故事主角之遭遇，反諷中國傳統風氣與思想的荼毒，很是符合新潮社的改革理念。而綜觀這些社員在校外所發表的文章，雖屬個人行為，卻都頗能切中新潮社提倡的議題。

以上，是關於新潮社在「五四」以前的活動分類和整理。

第七版，【自由論壇】。

67 傅斯年，〈朝鮮獨立運動之新教訓〉，《新潮》1卷4號，1919年4月，頁687-688。

68 在《新潮》2卷2號的〈新潮社記事〉欄中，有提到「這一年之內，既沒有投過稿，而其他方面又沒有絲毫的幫助，我們默認他為自請出社，以後有事，也不知會他了」。雖未講明是哪些人，但拿在此時所列的社員名單，與1918年12月3日在《北京大學日刊》上所刊登的新潮社發起社員名單相對照，成平已不在這次的社員名單上，除成平以外，黃建中（1889-1959）跟劉敵也在這時被取消社員資格。見〈新潮社記事（一）〉，《新潮》2卷2號，1919年12月1日，頁398。

69 舍我，〈吾友〉，《晨報》，1919年4月4日—4月5日，第七版，【自由論壇】。

70 成平這篇小說的內容及故事發展，尤其和汪敬熙（1893-1968）在《新潮》1卷1號上所寫的小說相似，都是在談他們好朋友受舊思想拖累，最後抑鬱而終的故事。見汪敬熙，〈誰使為之？〉，《新潮》1卷1號，1919年1月1日，頁103-104。

從中可了解到，新潮社的社務及活動是分為三層。核心社務，是出版《新潮》雜誌，藉由《新潮》雜誌將該社團所倡導的理念推廣出去。雜誌以外的社團集體活動，則為第二層的社務，屬推廣新潮社理念的輔助方式。最外層就是帶有集體意識、符合新潮社理念的社員個人行為。藉由這三層社團活動的運作方式，新潮社才能在「五四」前便建立了知名度並發其揮影響力。

## 小 結

經過本章的討論內容，筆者認為，有助於還原新潮社在「五四」以前的特色。而這種特色的呈現，才使其社團主張來源有所依據。

如新潮社的成員結構上，雖新潮社的公開規範中，對招募社員的規定雖不嚴格。然從本章的整理中，可看出在當時的諸多北大社團中，此社為一種趨向於精英的小團體。一是加入該社的社員，在地域、求學歷程等有關的人際網絡背景上，社員彼此間幾乎都有關聯，似乎要在這個相同的人際網絡下的人才加入該社。二是入社的學生社員，幾乎在加入新潮社前都已在北大校園內都有一定的知名度。此兩種心照不宣的篩選模式，讓這個看似人數不多的新潮社，卻具有相當高的凝聚力與知名度，並反映在此社社團活動的走向。

而從「五四」前的新潮社活動內容，更可得知新潮社的精英化成員結構走向，促成了該社成員在校內外的積極作為。這期間他們除致力辦《新潮》雜誌外，社員也藉參與校內聯合性質活動、以個人名義在其他刊物投稿等方式，宣揚新潮社的理念。又因新潮社每個社員都頗有主見，所以他們在宣揚某些集體意識的概念上時，會因每個人的觀點加以修飾，讓此時關於新思潮的內容更為多元。

總結新潮社的組織和社團活動內容，可看出新潮社向心力強，並直接表達了支持新文化運動的立場，所以其活動最後都能跟新文化運動的理念結合。不過，該社團的主要社務是出版《新潮》雜誌。因此，在探索社團的中心主張上，仍須從《新潮》中找出其精神。而關於新潮社各種主張的分析，筆者將留待第四章及第五章部分做詳細介紹。